

回眸集

罗宗义



团结出版社



责任编辑：郑观年

封面设计：梁 珊

ISBN 7-80061-356-9/ I·90

定价：4.60元

回眸集

罗宗义

团结出版社



回 眸 集

罗 宗 义

*

团结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皇城根南街84号)

河北文联印刷厂印刷

1990年8月(大32开)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

字数: 180.7千 印张: 8

印数: 2250

ISBN7—80061—356—9 / I · 90

定价: 4.60元(平)

序

杨 占 升

往事如烟，人生若梦，回想起来那已是三十四年前的事了。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双百”方针的指引，“向科学进军”的召唤，使广大知识分子感到无比兴奋。这时罗宗义也雄心勃勃，披挂上阵了，他当时是北师大中文系四年级学生，刚二十岁出头，在学习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时对茅盾发生了兴趣，写了《蚀》、《子夜》等小说的阅读札记，有的在中文系学生自己办的《蓓蕾》上发表，有的正在征求意见、加工修改。我当时也刚开始教中国现代文学，而且开讲的第一个作家就是茅盾。我们两人几乎是同时起步学习研究茅盾，而且都是试着运用茅盾那样的社会历史批评方式来进行学习研究的，因此就有了较多的共同语言。我有幸阅读过他的一些札记，并同他比较畅快地交换过意见。当时除王瑶、丁易、刘绶松三位先生的文学史对茅盾有较多的评述外，专门研究茅盾的论著不多，好象吴奔星先生的《茅盾小说讲话》就是唯一的专著了。这些书，我们也都找来读过，学了不少东西，但又不很满足。好象小孩子学步，还走不稳就想跑。他当然比我更有志气、也更有闯劲，当时就提出一些比较新颖的见解。我感到一朵学术上的蓓蕾就要绽开了。然而不幸，一场政治风暴寒凝大地，他蒙受了不白之冤。二十二年过去了！人的短暂一生能有几个二十二年啊？更何况这二十二年正是他最可宝贵的青壮年时期！我很为他惋惜、悲哀。所幸的是宗义这人的

生命力挺强的，他终于抗过了严寒，迎来了春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的错案得到了纠正，他的生命力又焕发出光彩。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很快他就给我寄来了《吴荪甫试论》一文。我拜读之余，不禁悲喜交加：喜的是他的事业心、上进心还是那么强，他的那朵憋闷已久的学术之花终于放出来了；悲的是他对吴荪甫的新看法早在1957年就形成了，直到1980年才得以公之于众，而且在当时的学术界还是颇有新意的。僵化、停滞，学术界的可悲命运。这篇论文，以其一家之言，很快就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发表了。从此，他就不断地有稿子寄来，大有一发而不可收之势。收在他这个集子里的篇什，大部分就写于这一时期，初稿我大都读过，也提过一些修改意见，有的甚至带有摧毁性。我认为，除去有关茅盾的评论之外，最值得提出的是他对李长之先生的两部鲁迅研究力作的论述。长之先生是一位很有才华的中国文学研究专家，他博通古今、融会中西，无论对古典文学还是现代文学，他都有自己的独到看法。他的文学批评很有见地和特色，他和李健吾、李广田一起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三李”。（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下卷318页）。早在1935年，他刚二十五岁，还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就写出《鲁迅批判》专著，引起鲁迅本人和学术界的瞩目。然而1957年后，连人带书都被打入冷宫，直到新时期才得到解放。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今天看来，这部著作仍然是鲁迅研究史上不可多得的珍品。《文学史家的鲁迅》三万余言，是作者为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写的，并在纪念期间向学术界作过演讲。这也是一篇很有分量的传世之作，是二十周年纪念时出类拔萃的鲁迅研究成果之一。可惜，由于历史的谬误和偏见，这些学术珍品长期被埋没，未能充分展示其价值。罗宗义的《从〈鲁迅批判〉到〈文学史家的鲁迅〉》，不论其褒贬当否，单是提出这两部论著来给以正面肯定的评价，就是很有眼见，很有意义的。长之先生是

我的老师，也是宗义的老师，他们两人在同一场政治风暴中一起蒙冤受屈。当时长之先生才四十七岁，就被剥夺了笔耕权力，1978年12月，还没等到彻底平反，他就病逝了，呜呼哀哉！罗宗义的这篇文章，也可看作是对长之先生的一点纪念吧。

宗义的这个评论集也存在着一些缺点，我感到最大的不足是他对李健吾、李长之这两位文学评论家的批评风格特点，他们的文学批评的独特个性讲得不够突出。这也难怪他，因为我们长期以来只习惯于用社会历史批评这一种方式来评判一切，对其它不同的批评方式就比较陌生，不易识别，也不易把握。毫无疑问，社会历史批评方式有它的历史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如果不把它引入误区，那它的生命力是永恒的，至少是经久不衰的。但是它的优越和强大，不能也不应该含盖一切、代替一切。而我们过去对它的理解和把握，不容讳言，有过偏颇，常常侧重于运用它的历史观而忽视它的美学观，往往注重作品对生活的客观反映而忽略作家创作的主体作用。这就导致了文学批评论著本身缺乏一种审美的艺术魅力。而两位李先生的文学批评却与此不同，他们都比较注意文学作品自身的特点，从直觉感受中、从整体上把握其风格神韵；他们注重审美批评，注重作家的创作个性。因此他们的文学批评论著多富有艺术魅力，能给人以美感享受。他们的这种文学批评的优点是值得我们充分认识和发扬的。这个意见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就难了。我还是少吹毛求疵吧。只希望宗义以后写出更有分量的论著来，超越这个集子，超越他现在的自己。

1990. 3. 12草于北师大

前 言

将这本微薄的小册子，奉献给读者，深觉惭愧，感慨不已。

虽然，除此以外，尚有二十余万字，但更不能登大雅之堂，只好“白发悲花落”。十年的心血，只有“回眸”而已。“不恨年华去也，只怨少年心事，强半为销磨。”虽有淡淡的哀愁涌上心头，但仍犹如一位“产妇”临产前的兴奋，情不自禁地感谢让“婴儿”平安出世的“助产士”——观年兄。

从目录看，读者不难发现有关茅盾的文章最多，其中必有因缘。大学同窗也许依稀了然，年轻朋友必将当觉茫然。

“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

1956年，“向科学进军”的号令似旋风袭卷高校校园。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乘风创办了《谷风》（杨占升师在《序》里误记为《蓓蕾》，《蓓蕾》是校学生会办的刊物，以发表创作为主，《谷风》才是中文系办的，以发表学术论文为主）。创刊号的“头条”，即是我的“处女作”：《关于〈子夜〉中的共产党员形象》。据主编许有为（此公不知落何处？传说已去香港，不知近况如何？）告之，此稿由钟敬文师夫人陈秋帆师审定的。

于是，我去拜访她。我走至门前，门虚掩着，敲门不应，我推门而进。不巧，秋帆师正病卧床榻。我急忙表示退出，待后再访；秋帆师不允，让我坐在床边。她强撑病体，紧靠床头，轻言细语，谆谆教诲。既有对此文的剖析，也有研究方法的开导，更

多的却是热情的鼓励。三十多年一瞬间，秋帆师早已作古，但我从那病弱的身躯，纤细的手势，轻声的话语，慈善的面容，感受到一颗滚烫的心！遥想当年，“空山不见人”，“欲语泪先流”。

不久，我又在《谷风》上发表了《浅谈〈子夜〉中的“儒林”形象》，正逢杨占升师讲授《茅盾》一章。料想不到，临下课前，他突然冒出了这么几句话：“关于《子夜》中的‘儒林’形象，新近有同学发表了很好的意见，我就不再赘述了。”也许他早已忘却，我却记忆犹新。当时，我真有“万人丛中一握手，使我衣袖三年春”之感，顿时脸红耳热，血液沸腾，受宠若惊，诚惶诚恐。

从此，即埋头伏案于图书馆。大约两个多月的心血，万余字的《吴荪甫论》脱稿了。《谷风》为此发了“消息”：下期即将刊登。其时正逢我二十岁“大寿”（1937年3月1日生），意想不到，我收到一份终身难忘礼物：《子夜》。扉页上，有六位同窗好友张海琛、张德文、周作祚、徐美英、徐克军、刘明芝的签名，并写下他们的祝愿：“望你获得更大的成功。”往事已悠悠，成功已无望；聊以慰藉的，也仅仅只有“回眸”而已。

写到这里，也许有好奇的读者会提出疑问：你为什么一试笔，就把目标对准了《子夜》呢？

这当然也有因由。1950年初，成都刚解放，一位在工厂里的叔叔带回来了两本书：《鲁迅小说集》、《子夜》。当时，我正沉醉在还珠楼主的武侠小说中，但也迫不及待地翻开了它们：新奇、陌生、深奥、遥远。它们似两座高不可攀的峨眉山和青城山，还被那郁郁葱葱的松柏所覆盖。不过，《子夜》中描写的交易所，我们似曾相识。1948、1949年，我曾随父多次出没在成都市的安乐寺，正娱花园的交易所里。那拥挤、嘈杂的人群，那光头上的淋漓油汗，那焦虑、兴奋、颓丧的变幻莫测的面孔，深深

刻在一个十二、三岁少年的脑痕上，但并没有萌发出什么欲望。后来，我又做着许多“梦”：“小海军”啦，“米丘林”啦。1952年，成都市一位著名的语文教师担任我的班主任，我的“梦”又开始了，特别是在成都市工商导报上发表了《接电线的故事》后，“作家”梦就常做不断了，一直“梦”到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吹醒了我的“梦”。当我试笔学写学术论文时，沉淀在心底里的《子夜》突然“复活”了。不知是一个什么偶然的原因，同时读到了冯雪峰的《中国文学中从古典现实主义到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发展的一个轮廓》和李立三在“八大”会议上的发言，以李立三的发言为佐证批驳冯雪峰观点的《关于〈子夜〉中的共产党员形象》就孕育诞生了。有人鼓励，有人提携，按照常规，当然也就“一发而不可收”了。

当时，真是“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殊不知“风乍起，吹皱一池清水”。1957年那个不平常的春天，《谷风》和我同遭厄运，《吴荪甫论》未见天日即埋在箱底，只好“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才“忽有梅花一两枝”，我开始在本地报刊发表一些文章（当时并未“改正”，感谢编辑巴雅尔的胆识）。1979年“改正”后，我翻出了《吴荪甫论》旧稿，不禁感绪万端：这个二十多年前未熟的“胎儿”，能否见到天日，恐怕仍是“觉来知是梦，不胜悲”，也许经历了多次的“阵痛”，仍然还是“难产”。重新修订后，在题目上加了个“试”字。我已过了“不惑之年”，少年气盛荡然无存，这个“试”字正是这种心态真实的反映。我贸然寄给二十多年来并未谋面的杨占升师，并无奢望发表之心，投石问路，聊以看看“行情”而已。不到几天，即收到杨占升师热情洋溢的信，他依然记得我这个“发配”塞外的不争气的学生，象批作业似的，在我的原稿上批上了一些意见，并嘱我修改后再给他寄去。我不知他有何用，也不知世上还有个专门研究现代文学的刊

物。不久，1980年第4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竟然发表了此文，据占升师后来说，此稿是经樊骏审定的。这时，我确有“印我青鞋第一痕”之感，尚未“死寂”的心注上了一剂强心针，明知“非人磨墨墨磨人”，又开始踏上漫长的征途。意想不到，《中国文艺年鉴》（1981年）登载的叶子铭、卜合士的《一九八〇年出版的茅盾作品和茅盾研究论著述评》竟然列到了拙文；又意想不到，1984年第1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登载的孙立川的《茅盾研究的发展脉络简评》再次提到了拙文。当然，他们只能就文论文，“谁解其中味”，并不知晓它二十多年来的辛酸历程，更不知晓它留在我心灵上不灭的印迹。不过，占升师能解其中味，不断寄柬惠书，教诲不断。这次，我寄书于京请他作序，他欣然应允。“青山也有白头时”，恐怕他已鬓华改；远处塞外，遥祝他平安长寿。

关于茅盾的文章，又断断续续地写了一些。值得一提的，倒有两篇。

1983年末写就的《茅盾是怎样培养文学新人的》，是寄给《文艺报》的，可不到一个月，我却意外地收到了《青春》的录用通知，并告之这是发行三十万份的文艺刊物。1984年第9期《青春》以“头条”的位置刊载，并在《编者的话》里说：“茅公离开我们三年多了，本刊发表罗宗义的文章，一则为寄托对茅盾的深切怀念，再则为倡导茅公之风。”对一个无名之辈如此厚重，实在令我惶恐不安了。“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行。”不过《文艺报》、《青春》竭尽提携之力，确有“茅公之风”。《文艺报》不采用，退稿也就算完成任务，若能写上几句鼓励的话，笔者也就心潮平复了，但及时转给《青春》，让它得以见天日，足见其责任心和提携之力，而《青春》也未因份外之事推委，更不因无名之辈不屑一顾，毅然以重要的位置推出此文，足见其厚爱无名之辈一贯之作风。写于此，除了感激之情，

还能有什么话可说呢？

《茅盾和李健吾在新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兼评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对茅盾和李健吾的论述》一文，是1986年参加第三届茅盾研究学术讨论会的学术论文。会后，接到中国人民大学王积贤的信，云《论文集》已收进此文，后又收到茅研会秘书处的正式通知。终审时，一家出版社抽掉了此文，并给我写了一封较长的信予以说明。这本来是十分正常的事，我却茫然不知隐藏着不正常的背景。1988年10月，我到厦门参加第四届茅盾研究学术讨论会，万树玉（编辑《论文集》的负责人之一）却把我拉到一个远离人群的僻静处，偷偷告诉我：“你那篇文章，我们一致同意编发，可出版社不同意。”（这十分正常，终审权不在茅研会手中。）“在北京运用马列主义观点分析文学不吃香，总卡住不让出。”（我当时确实大吃一惊，首都竟然如此这样，这就十分不正常了；当然，现在，明白了，读了《邓小平论文艺·编后记》也许全明白了。）此文并无什么新鲜的货色，只不过坚持文学批评的党性原则，坚持政治与艺术相统一的批评标准，抨击了所谓的“纯文学”的批评尺度。在当时，竟然不合时宜；现在，也许应该承认这是天经地义了吧。不过，《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编辑部崔振岚却认为“纯文学”的批评尺度应该抨击，未经修改，公然予以刊载，实在令人感佩。

我有自知之明，“得失寸心知”嘛。水平不高，知识面狭窄，研究方法也可能显得“老化”。我在旧轨道已经走惯了，要改也难哪，不过，不改也罢，总算保留点“个性”。在坚不坚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认识和分析文学现象这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上，我的头脑始终还是比较清醒的。“宁可枝头抱香花，何曾吹堕北风中。”当那些玄而又玄的概念术语充斥于市时，我不去赶时髦；当那些以“创新”为名否定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异端邪说招摇过市时，我也试一试我笔尖的锋芒。我一直认为：思维

应该拓宽，但不能离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本真经；方法必须多样，但不能离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根主轴；外国有益的东西必须引进，但绝不能走火入魔，拾人余唾，陷入泥淖而不能自拔。

这些文章大都是有感而发的，有的文章还含有纪念之情。《从〈鲁迅批判〉到〈文学史家的鲁迅〉》即为了纪念李长之师。长之师给我们讲授中国古典文学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当我从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找到了《鲁迅批判》（解放后未再版，学生时代又未阅读），欣喜若狂，当即复印全书带回赤峰，仔细研读，发现这本书在鲁迅研究的历史长河中的确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因此写下了此文。由于我还并未真正了解长之师，没有写好。编于此，既留下一点历史的印迹，又为以后有机会继续研究放一块基石。

编定成书时，大有激昂之情，慷慨之志，“浩然一曲酒千钟，男儿行处是，末要论穷通。”但抚昔追今，又有迟暮之感，

“不知筋力衰多少，但觉新来懒上楼”，甚至产生“书册埋头无了日，不如抛却去寻春”的欲念，地处塞外三十年，不如还乡寻旧朋。遥望天府之国，乡思不断。

但是，一曲终了，“鬓虽残，心未死”，锦瑟再弹且自勉。

1990年4月26日于红山脚下

目 录

序·····	北师大教授 杨占升(1)
前言·····	(1)
一、茅盾和李健吾在新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	(1)
——兼评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对茅盾和李健吾的论述	
二、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尽其批评的职能”·····	(17)
——茅盾文艺批评观一解	
三、反对“符咒”式的文艺批评·····	(28)
——茅盾文艺批评观二解	
四、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	(38)
——重评茅盾的《从牯岭到东京》及其批评	
五、茅盾文艺评论特色管窥·····	(53)
六、茅盾论作家和批评家的关系·····	(64)
七、茅盾是怎样培养文学新人的? ·····	(73)
八、创作的必由之路·····	(85)
——纪念茅盾诞辰九十周年	
九、吴荪甫试论·····	(95)
十、怎样阅读《子夜》? ·····	(107)
十一、关于《子夜》中的共产党员形象·····	(118)

十二、茅盾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学·····	(132)
十三、祥林嫂·阿Q·国民性·····	(146)
十四、从《鲁迅批判》到《文学史家的鲁迅》·····	(154)
——李长之对鲁迅研究的贡献	
十五、丁玲研究管窥·····	(165)
十六、丁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177)
——兼评现代文学史著中的丁玲	
十七、中国现代话剧的艺术高峰——曹禺·····	(190)
十八、郭沫若对中国现代历史剧的贡献·····	(206)
十九、夏衍在现代戏剧史上的地位·····	(220)
二十、田汉现代剧作简论·····	(235)

茅盾和李健吾在新文学 批评史上的地位

——兼评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 对茅盾和李健吾的论述

茅盾和李健吾似乎并不是必然关联的人物，但司马长风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却把两个人物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对比地联系在一起了：茅盾“虽写了不少批评，但都是以社会目标、政治尺度干预文学”，而“到了刘西渭，中国才有从文学尺度出发的，认真鉴赏同代作家和作品的批评家”，“没有刘西渭，三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几乎等于空白”，“新文学史上在文学批评家当中，能够破除门户之见，勤恳、广泛阅读同代作家的作品，并深入其中，亲切鉴赏，叮咛推敲的仅有刘西渭（李健吾）一个人。”^①这就涉及到他们在中国新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我们不能表示沉默了。任何一个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是由某个文学史家所能判定的，而只能用历史事实、只能在比较当中，才能确定。手握“史笔”的司马长风先生的品评，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呢？其比较，是否“是是非非严正不苟”^②呢？

一

首先应该分清的是非，当然是文学批评的尺度。仅仅以“政治尺度”来概括茅盾的文学批评，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完全抛弃“政治尺度”的批评标准也难以让人苟同。

在阶级社会里，在敌对阶级生死搏斗的年代，在民族危亡的

严重关头，离开政治而独立的纯“文学尺度”是根本不会存在的，只能是当时“自由人”、“第三种人”心造的幻影。任何阶级的文学批评家总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站在他所属的阶级或阶层的立场上来考察文艺现象，总结创作经验，评论作家的成败得失，支持某种倾向或反对某种倾向，以维护本阶级的利益，这是不能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茅盾，李健吾不能例外，恐怕司马长风先生也不能例外。

茅盾早在1925年发表的《论无产阶级艺术》中，就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应该承认文艺批评论确是站在一阶级的立足点上为本阶级的利益而立论的，所以无产阶级艺术的批评论将自居于拥护无产阶级利益的地位而尽其批评的职能。”这个文艺批评的原则，正是针对“自来的文艺批评家常常发‘艺术超然独立’的高论”并揭露其“不过是间接的防止有什么利于被支配阶级的艺术之发生罢了”的反动本质而提出来的。这个文学批评的鲜明的阶级标准，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无疑的，应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一个重要原则。茅盾的一生正是遵循这个原则，进行战斗的文学批评的。对于错误的以至反动的文艺思潮，他总是不遗余力地予以抨击；对于进步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他总是竭尽全力予以促进和推动。虽然这已经是历史事实了，但自居“独立”、“自由”立场的司马长风先生，是绝对不会同意的，因为，他已经判给茅盾“干预文学”的“罪名”了。

但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可能被司马长风先生忽略了，茅盾所持的文学批评尺度，绝不仅仅是所谓“政治尺度”，他反而对那种“政治判决”式的文学批评深恶痛绝。1936年，茅盾就说：“文艺批评的公式主义的又一端是把‘进步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呀，‘前进的世界观’呀，‘向生活学习’呀，等等术语当符咒。”^③茅盾是针对从二十年代末开始流行的一种“符咒”式的文学批评：把自己学到的一知半解的那点可怜的马克思主义